

上海市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研究

A Study o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tandards for Rural Communities in Shanghai

张 瑜 ZHANG Yu

摘 要 在乡村社区生活圈建设背景下,探索上海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定的基本思路和设计要点。针对当前上海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的活动场所建成后运营能力较弱、适应乡村特点和村民需求的文化供给较少、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个性化机制路径不完善等问题,通过对比研究已有标准经验,探索共享乡村社区公共设施并重新定义社区角色内涵,在标准制定上重点进行3方面探索:一是积极顺应集群化发展趋势,统筹布局动静设施;二是紧密结合数字化生活方式,实现服务精准供给;三是引导构建文化化运维模式,联结社区文旅产业。以期为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研究提供借鉴。

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rural community life circle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design priorities for establishing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tandards in Shanghai's rural communities. It discusses current challenges in Shanghai's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ncluding weak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of constructed activity spaces, insufficient cultural offerings tailored to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villagers' needs, and underdeveloped personalized mechanisms for integrating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By conducting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xisting standards and experiences, sharing public facilities in rural communities, and redefining the role and essence of communitie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ree key areas of exploration in standard formulation: (1) proactively adapting to cluster-based development trends through coordinated planning of facilities; (2) deeply integrating with digital lifestyles to achieve precise service delivery; (3) gui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ize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odels that link community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tourism industries.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tandards in rural communities.

关 键 词 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上海

Key words rural communitie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tandards; Shanghai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5) 04-0114-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 20250416

作者简介

张 瑜

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工程师,博士,zyhust1990@163.com

0 引言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自2017年施行以来,全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在乡村地区因地制宜的深化落实仍有待加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四有”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要求,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当前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

困境依然十分突出^[1]。这一背景下,以乡村振兴为抓手,持续细化、量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和支出责任,指导和规范和美乡村文化建设,成为推动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超大城市成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先行者。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扎实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功能定位、人口结构、用地和空间上的特殊性,决定了超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特征及规划实施的复杂性^[2]。近年来在

相关“刚性指标”规范下,上海公共文化服务的硬件设施基本满足了高标准文化建设需求。但现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多呈现单向性特征,存在部分“供需错配”现象,难以满足乡村居民日益个性化、品质化、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总结上海乡村现有公共文化服务的经验与教训,丰富并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软环境的“弹性指标”,构建以上海为代表的超大城市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框架,对推动全国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具有示范意义。

1 现状特征与问题

1.1 上海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特征

依托上海市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建立的上
海乡村振兴固定观察点监测评估数据基础,
以及2023年《上海乡村文化发展状况调
研报告》^①的调研反映,继续跟踪深化公共文化
服务需求调查。通过赴金山、嘉定、闵行、崇明等
涉农区部分乡村开展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情况的
调研,对农家书屋、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空间的使用
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当前上海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呈现以下5个特征。

(1) 基础性公共文化设施相对齐全。上
海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以生活驿站、睦邻
四堂间延伸农村公共服务配套,目前公共图
书馆、文化馆、街镇文化活动(分)中心、居
村综合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已实现
行政村全覆盖。一些村庄还围绕自身的文
化资源设立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场所:金山
区枫泾镇新义村围绕本村的“故事文化”
设立了中国故事展示厅;松江区泖港镇黄
桥村以楹联文化为特色布置了“楹联陈
列室”;奉贤区金汇镇资福村为其浓厚的
农耕文化特色设置了农耕文化展示厅。

(2) 乡村文化活动组织形式多样。在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上,上海市
进一步推动公共文化资源向乡村倾斜,支
持乡村民间文化团体开展符合乡村特点
的文化活动,持续开展“文化走亲”活
动,打造“一居村一品牌

活动”,引导“非遗在社区特色示范点(项
目)建设”。同时,乡村文化活动具有自上
而下的特征,如奉贤区金汇镇资福村拥有
村民自发组织而成的沪剧班和唱歌班,
定期开展文化活动。

(3) 乡村文化活动类型较丰富。2014
年,上海市启动公共文化配送改革,形成
了文化配送层级分明、资源互补、上下
互动的“市—区县—街镇—居村”4级
联动体系。农村地区文化配送的最后一级
单位是“生活驿站”,人均配送额度在远
郊地区与市区的比例为2:1。此外,市
文旅局组织开展“非遗在社区”展示与
示范项目、示范评选等活动,制定《关于
引导和培育“非遗在社区”示范点的指
导意见》,支持农村因地制宜举办各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节庆活动。

(4) 乡村文化治理基础较好。上海乡
村居民具有较为开明与现代化的价值观
念,乡村的旧观念、旧习俗已经得到改
变。上海在市级示范村创建过程中要求
保护传统建筑、农业遗迹,建立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和活态传承机制;因地制宜搭建
文化展示平台,延续乡村历史文脉;推进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积极引导村民
革除陈规陋习,广泛开展新时代好家风
好家训建设。如奉贤区李窑村打造包括
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信访调委会、
乡风评议会、贤贤理事会、公益集会在
内的“一约五会”治理体系,引导全体
村民参与。

(5)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潜力较大。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成为向城
市输出乡土文化价值、保护传承地方乡
愁记忆的重要区域,农业加工、体验旅
游等“农业+”发展导向为乡村带来更
多的产业功能和配套务工人员,不同产
业和人群需求日益丰富。近年来,上海
多措并举深化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
福乐园的建设。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已
成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驱动力。
如松江区兴达村引入“八十八亩田”创
业团队,以民宿为载体,推广“松江大
米”,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叶榭软
糕”;宝山区花红村盘活毛塘宅废旧仓
库,打造演绎中国传统耕织文化体验式
主题农场“耕织园”项目。

1.2 上海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当前上海乡村公共文化供给能满足大
多数乡村居民的基本需求,但对标乡村
居民精神生活富有的新需求,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供给内
容等方面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在公共
文化设施的使用效率、文化元素的挖掘
与再利用、文化遗产的传播形式上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

(1) 活动场所建成后的运营效率整体
偏低。调研结果显示,上海乡村居民对
于文化场所的满意度高,九成受访者表
示乡村文化场所“完全能满足”或“基
本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但选择“增加
文化场所的数量”“丰富文化场所的类
型”和“提升文化场所的质量”的受访
者仍然分别占总人数的54.3%、48.0%
和45.4%(见图1)。这一看似相悖的
结果反映了场所设施的运营效果未达预
期。从设施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由于缺
少后续使用和组织的相关标准,导致村
与村之间的使用频率、自我组织程度、
日常管护水平和供给内容质量参差不
齐。从配置对象上看,在行政管理效率
和公平原则的导向下,传统的设施配置
模式大多为基于行政村区划进行单村
配置设施,配置方式相对分散、低质,
缺少流动性,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并且
由于村与村之间的人均设施面积差异
明显,供不应求和资源浪费的不均衡现
象同时存在,空间使用效率有待提升。

(2) 适应乡村特点和村民需求的文化
供给较少。一方面,当前文化活动“菜
单式配送”过程中,城市社区居委和村
委共同竞争同份菜单,且主题多带有
对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教化与宣传任
务,主要集中在送戏下乡、送电影下
乡、读书看报等传统项目上,高水平、
高规格的文化产品“难抢”的现象时
有发生,配送到村的文化产品质量难
以保证。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缺少村民
参与的相关标准要求,和乡村自身特色
融入文化产品的路径指引,针对村民
差异化需求的文化服务尚未得以针对
性开展,加之部分乡村基层人才专业
队伍不强,干群沟通渠道不畅通,造
成部分乡村地区供需不匹配,村民参
与度继续

注释: ① 2023年,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委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开展上海乡村文化发展状况调研,形成《上海乡村文化发展状况调研报告》,为本次标准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参考。

降低,如此循环往复,乡村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容易固定在少数村民,公共性难以体现。

(3)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个性化机制路径有待深化。调查发现,上海乡村非遗项目如沪剧、田歌、酒酿等现有的传承人往往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量具有公共文化传播潜力的文化产品存在年龄断代危机,由继承传承向产业化方向进行“生产性保护”的转化机制尚不成熟。另外,由于部分邻近村庄的历史渊源一致,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思路也相似,各种村自行追求发展速度而缺少深度挖掘和对服务场景的整体设计,传播内容存在趋同化现象,试图体验乡村文化的城市居民深度融入的路径尚不清晰,导致审美疲劳,从而降低了农民与游客的参与积极性和乡村文化的传播效果。

2 研究思路

2.1 横向借鉴,对比研究已有标准经验

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设施建设上,近年来各地陆续制定了相应标准,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实现了乡村文化服务范式变革,配置标准逐渐由单一供给转向需求导向,服务理念由物理覆盖转向数字赋能,服务方式由静态服务转向活态传承,建筑设计从普适建设转向生态融合,运营模式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共治。如浙江省从数字顶层设计入手,强化标准规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依托“浙里

办”App,根据人群特征数据,运用算力模型,形成“可享”+“已享”两张服务清单,为数智时代乡村公共服务平台化供给提供了可循框架和理想图景^[3];成都“林盘文化合伙人”计划构建多元参与生态,引入社会资本建成非遗主题民宿、乡村美术馆等新型文化空间,带动本地手工艺人增收;安吉“生态博物馆标准”推动竹林观光路线与文化讲解服务绑定,拓展服务场景,提高游客文化消费。当前乡村公共服务标准正从“均量达标”向“质效并重”升级,通过需求精准化、数字智能化、文化活态化、生态融合化、运营社会化5大创新维度,重构乡村文化服务的供给逻辑。上海、成都、浙江等地的实践表明,标准化建设不仅解决了传统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还通过制度设计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生计资本,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久动能(见图2)。

2.2 纵向延伸,共享乡村社区公共设施

超大城市的公共设施布局不仅要考虑对当地服务人群需求的满足,还要考虑如何发挥公共服务设施对地区整体发展的引擎作用。建设部(现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的《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主要是对中心和一般镇的公共设施进行配置,对村级公共服务设施未做具体要求。在此基础上,上海主要对行政村“三室两点”进行底线管控^[4]。从

“十四五”以来相关要求规范的设计导向及趋势来看,上海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正以“标准化+特色化”为核心,通过刚性配置标准保障基础服务,结合数字化手段和地域文化创新提升服务品质。未来标准的设计重点将从“村村保障”向“精准服务供给”与“可持续运营”深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激活”(见表1)。

以金山区为例,2024年规划“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蓝图,将124个行政村根据地理区位划定60个左右乡村社区,分别完善各类设施建设(见图3)。2023年吕巷镇白漾村以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为契机,启动“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中心村白漾村为民服务中心设施项目,以建设“共享型核心公共节点、共建型便民服务综合体、共营型文化乡创空间、共乐型睦邻友好舞台”为理念,构建复合共享的一站式乡村社区生活圈,并通过融入智慧展厅、高空鹰眼等技术手段,助力智慧村庄建设。

根据上海市《金山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蓝图(2024年)》,金山区吕巷镇一共规划10个社区生活圈,包括2个居住社区生活圈、1个产业社区圈、7个乡村社区生活圈。其中,白漾乡村社区生活圈围绕和平村、白漾村和太平村形成的特色农业主产区,分别通过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推进特色蟠桃与农业旅游有机结合,串联区域内的白龙湖和蝶镜湖,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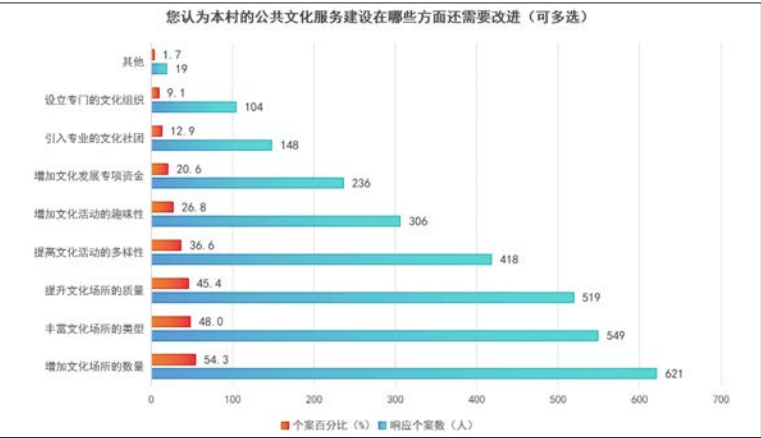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乡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改进意见调研结果
Fig.1 Survey results on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construction from rural residents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上海乡村文化发展状况调研报告》(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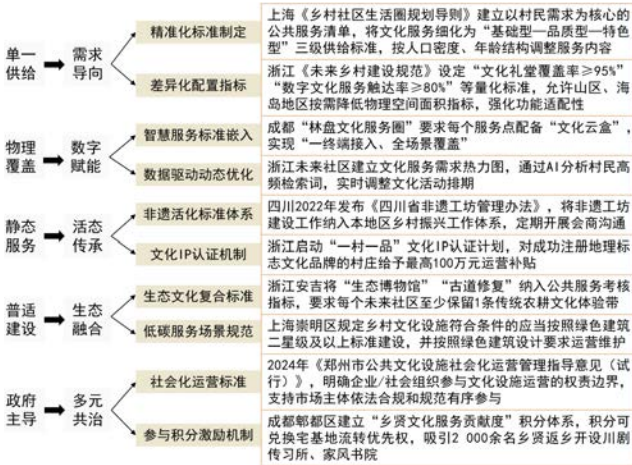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公共服务标准的设计趋势
Fig.2 Design trends of rural public service standar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联农文旅融合的多样功能,以“百果和平、生态白漾、健康太平”整体发展为目标,形成“一园两湖一圈”的乡村社区生态格局(见图4)。

和平村整合社区范围内的皇母蟠桃园、金石蟠桃园等特色果园及白龙湖水系,形成水果公园主题核心区块,串联多个水果采摘园,形成百果休闲体验区块,带动300余名村民就业。建成后每年通过举办“蟠桃节”“百花节”

等节庆活动,服务周边合作社产销对接,满足城乡多个年龄段人群的需求。2023年白漾村以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为契机,启动“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中心村白漾村为民服务中心设施项目,将村民办事服务、综合活动中心、医务室、乡村书屋、乡创中心、特色农业体验馆、志愿者服务站、文明服务中心、培训中心、议事堂,以及游客接待中心等融合于一体,构建复

合共享的一站式乡村社区生活圈,并通过融入智慧展厅、高空鹰眼等技术手段,助力智慧村庄建设。太平村挖掘“银杏”传统历史文化,提炼“低碳、美满、健康”等元素,对古银杏树周边环境进行改造提升,打造“吕巷十二时辰”“文明时光径”“百草园”等一批文化项目。围绕“重阳敬老”等主题,开展“心系百岁老人”“祖孙重阳亲子绘画”等乡村社区活动,得到村民的广泛参与和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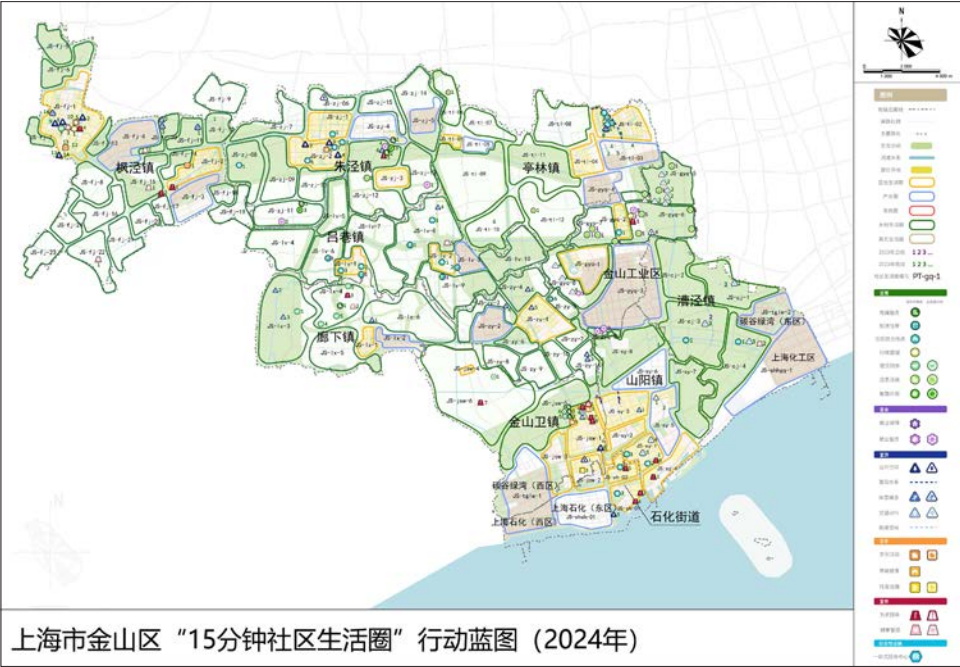


图3 上海市金山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蓝图
Fig.3 Action blueprint for "15-minute community life circles" in Jinshan District, Shanghai
资料来源: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网。

2.3 广泛参与,重新定义社区角色内涵

在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中,社区角色局限于配合政府完成设施建设与活动组织。随着城乡互动的增多,信息和人员流通更加顺畅,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村民在适应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强化了社区认同。加之合作社、社团、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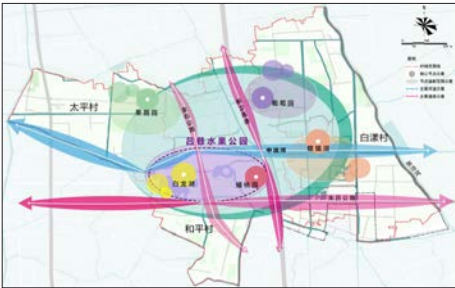


图4 白漾乡村社区生活圈建设格局
Fig.4 Development framework of Baiyang rural community life circle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白漾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方案》改绘。

表1 上海乡村公服设施配置标准相关文件及要求

Tab.1 Documents and requirements for Shanghai rural public service facility configuration standards

时间	文件名称	要求
2007年	《上海市郊区新市镇与中心村规划编制导则》	对郊区中心村的“三室两点”(村委会办公室、医疗室、多功能活动室和便利商店、室外健身点)提出必配要求和建议规模
2010年	《上海市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沿用“三室两点”的设施配置要求
2015年	《上海市郊区镇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导则》	提出“基本必配+高能级选配”的村庄设施类型,对行政村“三室两点”进行刚性管控
2020年	《上海市郊野单元(村庄)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和成果规范》	调整设施面积:乡村基本设施(必备)多功能活动室一般建筑面积为350—500 m ² ;高能级设施(选配)综合文化站一般用地面积不大于450 m ² /处
2021年	《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	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每个行政村至少建设1个,面积≥200 m ² ,含图书阅览室、数字影院、文化活动室。文化广场:面积≥500 m ² ,配备舞台、健身器材、夜间照明设施。数字化覆盖:实现行政村“数字文化驿站”全覆盖,提供电子图书借阅、远程文化培训服务
2021年	《上海市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提出“5+2+X”服务体系。基础型5项:卫生室、便利店、公交站、快递点、文化活动室;提升型2项:托幼服务点、健身步道;特色型X项:根据村庄特色增设茶室、创客空间等
2022年	《上海市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文化设施升级:2025年前完成300个村级文化服务中心数字化改造。非遗保护:每个涉农区至少建设2个乡村非遗传承基地,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文化活动标准:每村每月至少开展1场文化活动
2023年	《上海市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	提出文化融合的要求:保护修缮乡村历史建筑、古桥、古树,打造“乡愁文化地标”。建设“乡村微型博物馆”,展示农耕器具、方言民俗等内容,每区至少试点5个村
2024年	《上海市乡村文化振兴三年行动计划》	2026年前实现村级数字文化驿站100%覆盖;培育100支本土文化团队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上海市相关规范文件整理。

营主体等“自组织”直接参与包含乡村文化更新在内的综合功能,乡村社区不再仅是空间载体的概念,更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现象。社区营建已成为消解集体社会解构危机、建构内生发展机制的重要路径^[5]。社区服务应突出其“社群”之义,挖掘“草根”资源,通过各类公共文化活动促进互动,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形成生活“场景”和公共空间吸引力^[6-7]。通过具有历史和生活基础的公共文化活动铸造联系的纽带,在乡村社会日益呈现出“原子化”和“去公共化”的趋势下,发挥互动、认同和凝聚的作用,有助于乡村社会公共性和共同体的重建^[8]。

上海市区范围内的社区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诸多具有高度社会凝聚力的情感场域,逐步从“标准化供给的被服务者”转型为“共同创造者”。当前乡村社区的建设还在探索过程中,此次标准设计通过对公众参与机制的持续完善,引导社区成员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与评估,重构社区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这一转变既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精准性的关键路径,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3 设计要点

针对当前上海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面临的问题,结合上海全市已划定的乡村社区生活圈范围,本次标准框架下乡村社区的区域空间范围以镇村体系结构为基础,根据乡村居民以步行、公共交通、电瓶车、自行车等交通方式15 min左右可达的区域,及其地域范围农村居民住宅区辐射半径为1.5 km左右,一般涉及1—3个行政村(10—30个自然村组)。一方面,在现有用地发展条件下,需有效引导村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和整体布局,明确设施布局标准,构建“中心辐射+片区联动”的服务网络,通过静态设施的多功能改造和动态设施的模块化组合来提高场所运营效率。另一方面,在资源配置和管理运维标准设计上,需通过建立“需求—资源”的智能匹配系统,激活数字技术潜能,实现服

务精准供给。在完善村民自治机制的基础上,联结社区文旅产业,通过完善队伍建设、资金保障和公众参与标准,引导“公益+市场+合伙人”共同加入文化事业,构建乡村社区多元参与生态(见图5)。

3.1 积极顺应集群化发展趋势,统筹布局动静设施

在上海建设用地减量化与乡村振兴的双重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用地的首要原则是跨越镇村行政边界,集约利用现有设施资源。近郊地区统筹乡村社区与城镇社区已有设施基础,中远郊地区以镇为单位整合共享各村设施。截至2024年底,上海市已累计建成339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完成14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累计占全市行政村总量的24.4%。2024年开始,计划每年选择5个重点区域(每个区域不超过2个乡镇或10个行政村)开展上海市“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聚焦建成的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及其周边的其他行政村,探索打破村行政边界,推动和美乡村试点与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有效衔接,实现连点成线、集群成片。

在这一片区化发展背景下,打破传统分散布局模式,平衡静态和动态设施的资源配置,将公共设施配置与引导村庄集聚、集约发展相结合^[9],确保文化服务的可持续性和覆盖面,特别是在人口密度较低的乡村地区避免重复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硬件设施标准的基本原则。在依托传统“千人指标”和村镇等级确定规划布局外根据“协同配置”的理念,引入“类型协同”和“区域协同”的配置思路^[10]。以乡村社区中心村为核心,构建“基础必配(刚性)+社区协同(弹性)”的模块化指引,以已按照相关建设标准要求的行政村配建设施为基础,关注问卷调查中村民对设施的使用需求和频率,将使用频率高和需求大的设施调整为中心村基础必备的刚性设施。集中设置多功能、复合型、一站式的刚性设施要素(如综合文化活动室、事务服务大厅等)。针对现行配置

标准缺少对文化利用型设施的配置引导的问题,依托周边村庄特色引导设置弹性设施要素(如乡创中心、文化展示馆、流动性文旅活动场所等),布局“一核多点”的设施网络,体现不同社区单元的差异性,进一步提升设施的配置效率和精准性^[11](见表2)。

3.2 紧密结合数字化生活方式,实现服务精准供给

数字技术赋能可以打破乡村公共服务信息资源的部门壁垒、区域差异,推动公共服务信息的网络化集成,实现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个性化、定制化、互动化^[12-13]。从2016年开始,上海上线“文化上海云”一站式数字平台,连通全市780多家市、区、街镇的文化馆、图书馆、展览馆、美术馆、文化服务中心等公共文化活动信息,每年数十万场活动可供市民手机预约参加。2018年市、区两级推出“文化云盒”,依托“文化上海云”数字平台,推进农村地区文化智能终端建设,将数字资源进一步引入居村一级。截至2023年,“文化云盒”平台注册用户超过500万,年均服务点击量突破2亿次,公共文化设施使用率提升30%。郊区文化资源访问量占比从20%增至45%,有效缓解了城乡文化服务不均衡问题。

此次标准制定上,紧密结合数字平台资源和村民日益依赖“指尖”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在“文化云盒”平台延伸板块,研究完善“乡



图5 上海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的设计要点
Fig.5 Key design points for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tandards in Shanghai's rural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2 设施要素基本要求
Tab.2 Basic requirements for facility element

类型	要素名称	服务内容	规划建设标准	配置形式	布局及建设指引
刚性设施要素	综合文化活动室 (党员远教播放点)	党员远教播放点、文艺演出、展览、电影放映、大型会议、百姓戏台、农民书屋、道德讲堂、网络直播平台、妇女之家、儿童之家、母婴设施等	500 m ² ≥ 建筑面积 ≥350 m ²	综合设置	—
	事务服务大厅(党群服务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党群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服务等	建筑面积≥400 m ²	综合设置	布局在一楼
	多功能运动场	广场舞等室外的健身场地,配有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设施的活动和游戏空间,如篮球场、羽毛球场、小型足球场等	用地面积≥400 m ²	独立占地	鼓励与其他村级设施集中设置,可与绿地结合设置,可多点设置
弹性设施要素	乡创中心(青年中心)	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创业指导、人才交流等	建筑面积≥200 m ²	综合设置	创业青年较多的村庄按需配置,可利用综合文化活动室或为农综合服务站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文化街区园区、“悦读吧”、文化驿站、文旅融合型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建筑面积≥50 m ²	综合设置	多村共享,综合设置,分时使用
	文化展示馆	村史馆、农耕文化博物馆	建筑面积≥50 m ²	综合设置	在综合文化活室内综合设置
	居村儿童之家	因地制宜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婴幼儿养育托管、儿童课后托管、游戏娱乐、亲子阅读、家庭教育指导、主题实践活动、保护和转介等服务	建筑面积≥50 m ²	综合设置	与乡村长者照护之家综合设置
	红白事中心 (村民食堂)	举办红白事,兼具膳食供应,提供堂食或配送至老年人家家庭	用地面积≥400 m ² ; 1 000 m ² ≥ 建筑面积 ≥500 m ²	综合设置	多村共享,集中设置,分时使用,村民食堂可兼做老年助餐服务,有旅游功能的村可兼容特色餐饮服务
	农产品售展中心 (农夫市集)	村民售卖农产品的场所	—	综合设置	按需不定期使用,可露天临时设置
	游客服务中心	提供旅游信息、咨询、失物招领、纪念品售卖等	—	综合设置	有旅游功能的村根据游客流量按需配置
	流动性文旅活动场所	提供文创产品、纪念品售卖等	—	流动区域引导设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村文化云盒”的系统架构和核心模块,进一步优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通过“数据采集—智能分析—精准调度—动态反馈”的闭环逻辑,标准化引导远程数字信息技术及服务流动,突破“核心+外围”的辐射模式,链接社会、文化、群众偏好类似的更大范围内人群。利用智能新技术对村民和游客的需求进行获取和分析,更加精准匹配乡村社区内不同“文化服务单元”的共性需求。建立“市级统筹+区域特色”资源分层机制,通过智能派单及对活动评价数据进行不断反馈调整,最大限度发挥数字新技术在破解传统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中供需错配、资源闲置等问题上的效用(见图6)。

3.3 引导构建文化化运维模式,联结社区文旅产业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文教结合、文旅融合等带来的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也为实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受众人群不断扩大的“公共文化+”奠定了基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亟需突破传统“输血式”供给模式,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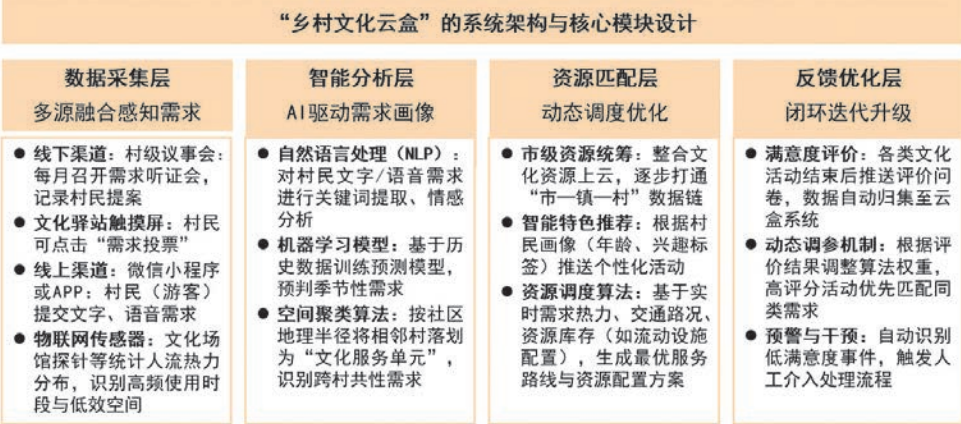


图6 “乡村文化云盒”的系统架构与核心模块设计
Fig.6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core module design of "Rural Cultural Cloud Box"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向以文化价值挖掘、社区参与和产业联动为核心的“文化化运维”。本次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的制定重点关注城乡文化融合背景下特色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精细化供给内容,将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通过“资源活化—场景创新—利益共享—治理协同”的闭环逻辑,以公共文化服务为纽带,为文化产业的相关服务设施提供“场

景式”的设置指引,激活乡村“文化—人—产业”的共生关系,形成可持续的共生模式,破解“重建轻管”难题(见图7)。通过构建多元参与共享生态,强化游客体验提升,从实质上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调动各类经济主体投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积极性^[14]。同时引导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以主体共建、区域共享为策略,增强农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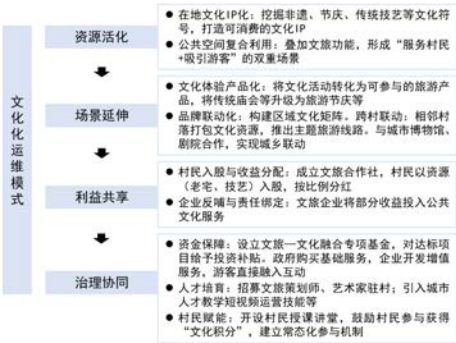


图7 文化化运维模式构建
Fig.7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ize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ode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得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从“消耗性投入”向“增值性资产”的转型,进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横向(村际)和纵向(城乡)合理流动^[15]。

4 结语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配置与供给是一个涉及行政事权、乡镇规划、管理运维、资金统筹、用户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标准设计已从“设施覆盖”转向“质量提升”和“机制创新”。本文基于超大城市和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发展挑战与转型逻辑,提取当下乡村社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要素,结合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圈层设施建设基础和发展趋势进行规范和引导,从多个层面提出创新、探索的基本要求和引导思路,是对上海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的补充与深化。目前,经广泛吸收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上海市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建议稿)已完成设计,将适时用于申请上海市农业农村领域标准研制项目并进行审查,获批后正式出版应用于上海市乡村社区生活圈建设。随着乡村居民和外来人群需求的不断变化,还需健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适时调整具体指标。同时在确保设施用地复合、功能综合,平衡政府供给和社会参与的具体边界,强化城乡文化服务标准的衔接互认,实现高效运营与文化振兴等方面进行细化研究。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孙琦,田鹏.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1): 118-127.
SUN Qi, TIAN Peng. Practical logic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field survey based on new rural communities in northern Jiangsu[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 22(1): 118-127.

[2] 刘晟,黄建中. 超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特征与规划应对——以上海市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2(5): 67-73.
LIU Sheng, HUANG Jianzhong.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ning respons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megacity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2(5): 67-73.

[3] 汤资岚. 乡村公共服务平台化供给的实践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浙江省“整体智治”的经验考察[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3, 22(6): 801-810.
TANG Zilan. Ractical logic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platformized supply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Overall Intelligent Governance" in Zhejiang Province[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3, 22(6): 801-810.

[4] 付毓,田菲. 需求导向下上海乡村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编制思路[C]//人民城市,规划赋能——2022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3: 1869-1880.
FU Yu, TIAN Fei.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rural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planning under demand orientation[C]//People's city, empowering planning -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China Annual National Planning Conferenc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23: 1869-1880.

[5] 丁蔚,崔东旭,崔恒瑞,等. 地方依恋视角下乡村社区营建的内涵、机制与实施策略研究[J]. 上海城市规划, 2024(2): 146-153.
DING Wei, CUI Dongxu, CUI Hengrui, et al.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attachment[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4(2): 146-153.

[6] 高宏存. 理念更新带动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J]. 行政管理改革, 2019(5): 27-29.
GAO Hongcun. Pushing innovation of rural community public culture service by renewing ideas[J]. Administration Reform, 2019(5): 27-29.

[7] 吴建中. 社会力量办公共文化是大趋势[J]. 图书馆论坛, 2016, 36(8): 37-38.
WU Jianzhong. A general trend for social forces to support public culture[J]. Library Tribune, 2016, 36(8): 37-38.

[8] 潘鲁生. 中国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新论——以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为例[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6): 118-122.
PAN Lusheng. A new discussion of constructing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culture in Chinese rural communities: taking the new districts along the west coast of Qingdao for examples[J].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19(6): 118-122.

[9] 张京祥,陆泉麟. 协奏还是变奏:对当前城乡统筹规划实践的检讨[J].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1): 12-15.
ZHANG Jingxiang, LU Xiaolin. Concert or variation: a review of current urban-rural coordinated planning practices[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0, 25(1): 12-15.

[10] 耿健,张兵,王宏远. 村镇公共服务设施的“协同配置”——探索规划方法的改进[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4): 88-93.
GENG Jian, ZHANG Bing, WANG Hongyuan. Coordinated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planning methodology[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4): 88-93.

[11] 马倩丽,何微丹,李晓军,等. 乡村生活圈空间优化与差异化设施配置研究——以广州为例[J]. 规划师, 2024, 40(12): 58-66.
MA Qianli, HE Weidan, LI Xiaojun, et al. Research on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differentiated facility allocation in rural life circl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J]. Planners, 2024, 40(12): 58-66.

[12] 郭美荣,李瑾,马晨. 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现状与提升策略[J]. 中国软科学, 2021(7): 13-20.
GUO Meirong, LI Jin, MA Ch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J]. China Soft Science, 2021(7): 13-20.

[13] 曹明.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 中州学刊, 2022(10): 69-75.
CAO Ming.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rural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22(10): 69-75.

[14] 沈山,路郅淞,夏民治,等. 均等化理念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研究进展[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34(1): 1-5.
SHEN Shan, LU Hansong, XIA Minzhi,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ural cultural public service facility under the concept of equalization[J]. Journal of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6, 34(1): 1-5.

[15] 任贵州. 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建共享的政府责任研究[J]. 理论建设, 2017(2): 44-49.
REN Guizhou. Research on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for promot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acilities[J].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2017(2): 44-49.